

從《台北人·孤戀花》中看“靈肉之爭”的主題

歐陽子曾概括《台北人》的主題為“今昔之比”、“靈肉之爭”、“生死之謎”，但與其他兩大主題相比，“靈肉之爭”這一主題鮮少被人提及，因為“靈”與“肉”並非一種學識問題，而是對生命的直覺體認和敏感感受。

依據不同人對生命不同的洞察角度，對“靈肉之爭”亦有不同的探索，這便使其內涵愈加豐富。

《台北人》中“靈”與“肉”的關係，我認為可分為三種，一是用“靈”去禁錮“肉”，代表是《花橋榮記》中苦等羅家姑娘的盧先生與《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中為小麗兒甘願付出一切的王雄，羅家姑娘與小麗兒是他們的“靈”，是他們的愛情，他們為這份愛情寧願拋棄成年男人的性欲，這裡的性欲便是“肉”，用高尚的愛情去禁錮不堪的性欲，這樣的結果往往是“肉”衝破“靈”，走向毀滅；二是用“肉”去追憶“靈”，代表是《冬夜》中落魄“只想出國”的吳柱國與《歲除》中喝醉就提“台兒莊”的賴鳴升，五四運動與台兒莊戰役是他們一生中最輝煌的時刻，是他們的理想，是他們的“靈”，而此刻因政治遷到臺灣的“青年英雄”如今已只剩一個衰敗的肉體軀殼，這個衰敗的“肉”讓他們無法再去追逐“靈”的理想，唯有偶然回顧，這倒是“靈”與“肉”最相安無事的局面；三是完全拋棄“靈”追逐“肉”，代表便是《孤戀花》中的柯老雄和華三，同時《花橋榮記》中舉止粗俗的洗衣婦阿春與《那片血一樣的杜鵑花》中肥壯的下女喜梅也是唯肉不靈的典型，他們沉浸于肉欲，白先勇有意獸化地去描寫他們，便是認為人無靈便同獸無異，這也是最為作者鄙夷的“靈”與“肉”之關係。

《孤戀花》為讀者呈現的是在社會變遷中底層人民的生存困境，這裡的世界是一個莫比烏斯環裡的動物世界。無論時空如何轉換，殘酷的生存戰爭從未在這個世界中停止，然而可貴的是，作者相信，即使是在肉欲統治的世界，人性的光芒也絕不會完全消亡，在充溢著“肉”的世界，“靈”也依然存在。

動物世界：獸性化的男性角色與倫理的喪失

作者把小說放在地下社會的背景中，與其說這是一個地下社會，到不如說是一個動物世界。底層人民螻蛄般地在陰暗狹小的空間內求生，生存的艱難已經磨滅了他們本就

不多的人性。在這裡，他們遵循著古老的動物法則，對力量的崇拜，對血腥的追逐，對弱者的踐踏。

明顯地，男性在小說中代表著動物世界裡的獸性。無論是在上海萬春樓虐待五寶的流氓華三，還是台北五月花凌辱娟娟的毒梟柯老雄與玩弄舞女的日本狎客，甚至是蘇州鄉下強姦娟娟的娟娟生父，都象徵著動物世界裡強大的施暴者，他們醜陋，骯髒，兇殘，嗜血，齷齪，淫蕩。作者去掉他們身上所有人的部分，對他們的描寫也用獸來代替。如形容柯老雄的外貌時說他有“魚”腥味，有“狐”臭，兩個牙已骨像“鯉魚”腮，倒豎之硬發如“豬”鬃，還長著一對滿布血絲的“豬”眼睛，形容其行動舉止時說“尖起鼻子便在娟娟的頸脖嗅了一輪，一隻手在她胸上摩掌起來”，“伸出舌頭便在她腋下舐了幾下”，“抓住她的手，便往他腹下摸去”，在底層強者身上盡是獸類的骯髒與齷齪。

動物世界是不存在倫理的，母螳螂能吃下配對的公螳螂，這是出於獸欲，出於繁殖的本能。同時，娟娟的母親在喪失繁殖功能後被捨棄，被當作豬關進豬欄裡；父親在失去正常配偶後出於獸欲對女兒的姦淫；娟娟家庭的存在就是因著生物繁殖的本能，肉欲是連系一家人唯一的管道。可娟娟卻是這個家庭裡唯一一個有一絲人性的存在，她同情瘋子母親，爬過豬欄給母親遞菜飯，卻被瘋癲的母親在咽喉下咬出如蚯蚓般鮮亮的紅疤。我想，這個疤痕的疼痛如影隨形地提醒著娟娟，順從這個充滿肉欲的動物世界，於是多年後，她在被柯老雄虐待得不成人樣時，也只能說一句，“沒法子喲”。

把人放進動物世界無疑是悲劇的開端，娟娟的無條件順從仍然無法使她在這個殘酷的世界生存下來，直到有一天她終於像一隻發了狂的野貓似地敲開柯老雄的天靈蓋。在殺掉一隻獸類後，浸在鮮血裡的人也變成了動物。瘋人院裡的娟娟和豬欄裡的母親變成同一種動物，她們不識人，不懂人類世界的關係，沒有父母朋友，遇到危險時會咬人，覺得安全時也會笑。

弗洛伊德認為人類有兩種基本上互相矛盾的本能：一種是性的本能，即延續肉體生命的求生本能；另一種更深匿於潛意識內的，是死的本能，即破滅肉體生命的自毀本能，這其實就是我們這裡所說的“靈肉之爭”。“靈”，要掙脫“肉”，人就不得不自毀；“肉”，要繼續生存，人就必須滿足性欲，不斷繁殖。五寶選擇“靈”的本能，結束自己的生命，而娟娟選擇了“肉”的本能，變成動物世界裡的另一隻動物。

莫比烏斯環：下層女性逃不開的宿命與中國悲劇意識

莫比烏斯環看似有正反兩個面，然而其實只有一個面，倘若在莫比烏斯環上行走，

將會陷入無限的迴圈。正如五寶與娟娟，明明是兩個不一樣的人，卻隔著時空在重複著一樣的下層女性悲劇。作者借雲芳之口，敘述著一個無盡的悲慘輪回，“兩個人都長著那麼一副飄落的薄命相”，面對華三和柯老雄的虐待，兩人不約而同地選擇了順從，“這是命”，“沒法子喲”。甚至用意識流的手法故意混淆二人身份，中元節那天晚上，雲芳回憶的是五寶自殺前被華三虐待，“我要變成鬼去尋他”，可提起菜刀沖進屋，看到的卻是用熨斗錘死柯老雄的娟娟。也是在此刻，五寶與娟娟合二為一，“她那瘦白的身子……突然好像暴漲了幾倍似的”，下層娼妓悲劇的命運從莫比烏斯環的無數個起點開始，都在這一刻結束。

無疑，白先勇的作品都帶著一種悲天憫人的命運意識。白先勇言，“人生是虛無，一場夢，一個記憶”，足以見得白先勇認為任何人事物終究會被命運推向一個巨大的無所不在的虛無之中，但白先勇的宿命論絕不是悲觀消極的，他信奉佛教中的輪回。在輪回中，現在的你是曾經和你一樣的人輪回而生，但你已不是他，你會隨時間消失，在未來出現，但也不是你了。好比在莫比烏斯環上走一樣的路，也不是曾經的路了，但路上的風景只有這次行走的你才能知道。正如五寶與娟娟能夠有雲芳至情至真的一路陪伴，在黑暗中亦有人性光芒閃爍。這也便是中國文化與西方完全不同的悲劇意識，於輪回的虛無無常中回味過去的珍貴記憶，而虛無更加襯托出現實的美好。如司馬遷所言，“既歎其無常而生感慨，亦由此感慨而更增益深情，更肯定人間之實在”，這種人生虛幻感與實在感的相互交融，彼此相生相剋，使得中國文人既可感受到“絕對之孤獨空虛而至悲”，又可“返虛入實，由悲至壯”，甚至“可轉出更高之對人間之愛與人生責任感”。

人性的微光：“靈”之美 同性之愛

《台北人》中歡場女性的角色並不少，諸如率真潑辣的金大班、高貴冷豔的尹雪豔、八面玲瓏的朱青，但她們都曾有過意氣風發之時，而《孤戀花》中的五寶、娟娟與雲芳卻始終深陷命運悲劇的沼澤之中，苟延殘喘於動物世界陰冷的一隅。魯迅先生說，悲劇就是把美好的東西毀滅給人看，但如果它從未美好呢？對於《孤戀花》中的底層人民來說，大陸和台北沒有區別，過去和現在也沒有區別，不過都是弱肉強食的廝殺罷了。即便這樣，我們還是能看到這些生活在地獄之中的人對愛與美的追求，“靈”與“肉”是可以分離的，肉體在受苦，但靈魂卻仍然希冀美好的事物。林三郎這個爛得快瞎的老樂師，每日用磨得油黃的手風琴為逝去的酒女拉《孤戀花》的哀調。雲芳與五寶的心願是能夠買房子成家，五寶死後雲芳用自己一生積蓄同五寶的翡翠鐲子買下金華街的這棟公寓，

然後對娟娟說：“這便是我們的家了。”。可以看出，在“靈肉之爭”中，白先勇認可的是如娟娟、五寶和雲芳這樣為“靈”而受“肉”之苦的人，而鄙夷如柯老雄、華三這樣為“肉”而拋棄“靈”之人，對於這些肉欲滿身之人，白先勇用形容動物的詞來敘述他們，這些人已然與低等動物無疑。

由此可見，一個人倘若喪失“靈”，便只能做動物世界裡一隻為生存與同類廝殺的動物了。

同時，在白先勇壓抑悲涼的字裡行間，唯一讓讀者感到欣慰的便是五寶、娟娟與雲芳相互扶持的同性之愛。在這個肉欲彌漫的動物世界裡，金華街的公寓是個與世隔絕的存在，娟娟與雲芳在這裡舔舐傷口，這是超越性別的“靈”的愛戀。在這對同性伴侶身上，白先勇並沒有任何關於性愛場面的描寫，性愛在這裡只出現在娼妓與嫖客之間，而且比起性愛，性虐待更能形容這種關係，粗暴得仿佛是一種動物交配才會發生的低級、充滿野性與暴力的行為，所以我覺得這裡的性關係是一種象徵著肉欲的罪惡，是一種原始欲望下動物的本能。白先勇也多次在《台北人》中用這樣的“性罪惡”描寫人物的墮落與癡狂，如《那片血一樣的杜鵑花》中王雄喪失在小麗兒身上對“靈”的追求後，將主人家那個“胸脯挺得高高的”女僕喜妹強姦。作為一個留洋多年的學者，白先勇從不吝在文學作品中談“性”，同時作為一個家門顯赫的少爺，作為一個曾被社會認為成特殊人群的同性戀者，白先勇又接受過中國傳統社會中談“性”色變的文化，在他的作品中，我們能看到東西方兩種不同的對“性”態度，即西方的原始化性欲與東方的寄託於“靈”的性欲，也能看出，白先勇更贊成這種“靈”化的性欲，認為其更能展現人性之美。

結語：動物世界與現實世界

《孤戀花》中的動物世界其實是現實世界的一個象徵，它放大現實世界中的“靈肉之爭”。獸性化的男性象徵著“肉”，人性之光尚存的女性象徵著“靈”，二者之間以性相連。男性看似凌駕於女性之上，然而事實上卻也是被“肉”所操控，是一具沉迷性欲的骯髒肉體。在這裡，女性角色五寶與娟娟對“肉”的反抗跨越時空重合，也許就是作者認為，“靈”的力量能夠超越時空，倘若人的肉體終究陷入輪回，人性的美好也會永遠地留在時空中的某一處。不過，《孤戀花》中，我認為最為悲劇的一點是，娟娟由人轉化成動物的結局，它用赤裸裸地告訴我們，“靈”本高於“肉”，這是我們的美好幻想，但在殘酷現實中，“肉”卻戰勝了“靈”，可以說，《台北人》這本書幾乎每個故事都帶著這種現實的悲劇基調，這也是白先勇對當時籠罩在“白色恐怖”的烏雲之下，近乎崩潰的臺灣社會的

警醒，只有深深地刺痛社會無數正在為“靈”同“肉”戰爭者的心，才能從絕望之中誕生希望，才能把這個社會從崩潰的邊緣拉回來。

余光中說，“白先勇是現代中國最敏感的傷心人”，這個“傷心人”因著自己特殊的性取向與父親的身份，一直徘徊在社會的邊緣。他的一生從父親移居臺灣開始就經歷太多變故，所以他相信世間萬物皆無常，他愛過很多人很多地方，但他也被迫離開過他所愛的一切，死神早早地奪走他摯愛的母親與伴侶，父親的政治身份讓他揮別故土桂林。人活在世上，肉體的苦痛是受不完的，但他卻也堅信，人性的美好足以支持著人克服這一切的苦痛，他與母親及伴侶深厚的感情，他對桂林對大陸的愛，乃至對整個中國文化的熱愛，支援著他以“肉”之苦得“靈”之美。

引用資料：

1. 歐陽子：《白先勇的小說世界》，見白先勇：《台北人》。上海文藝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 頁。
2. 歐陽子：《王謝堂前的燕子》，見《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裡的隱喻和象徵。廣西師範大學 2014 年版。
3. 沈慶利：《臺灣文學研究》，見溯夢“唯美中國”--論白先勇《台北人》的經典意義。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Issue 09,pp.190-199。